

〔俄〕史禄国 著
吴有刚 赵复兴 孟克 译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俄〕史 禄 国 著
吴 有 刚
赵 复 兴 译
孟 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呼和浩特

40105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俄〕史禄国 著

吴有刚 赵复兴 孟克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375 字数:570千 插图:2

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统一书号:11089·55 每册:3.30元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史禄国(1889—1939)，原名希罗科戈罗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是俄国著名的通古斯学者。一九一〇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学院。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一九一五年被选为人类学学部委员。曾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在俄国后贝加尔和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在我国东北多次进行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十月革命以后流亡我国，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〇年先后在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一九三〇年以后在北平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到福建、广东、云南和东北等地进行过学术调查。一九三九年逝世于北平。《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就是以他在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地区所搜集的材料编写的。

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作者对鄂温克、鄂伦春等族通称为北方通古斯人，“通古斯”在世界上已成为一个学术名词。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是一本民族学专著，它对鄂温克人、鄂伦春人所处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氏族分布、氏族组织和职能、婚姻、家庭、财产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做了全面的阐述，是一本全面了解和研究鄂温克、鄂伦春社会历史情况的重要参考书。

作者对我国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查，在本书中充分的利用了这些材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作者在编写该

书的过程中，引用了几十种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和著作，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书目。

作者是俄国资产阶级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是为沙皇俄国效劳的，本书有些章节渗透着他的这一反动立场。他假借我国鄂伦春人的话，将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俄匪头目穆拉维耶夫说成是“最伟大的俄国人”（见121页②注）；他还极力美化沙俄对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统治政策。说沙俄向通古斯人征收贡品，“他们并不反对”，而且是“自愿承担”，并说“通古斯人需要俄国政府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给予帮助时，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得到高级官员的允诺。”（见146页）

作者在极力赞美沙俄对通古斯人的压迫剥削政策的同时，却对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列宁同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污蔑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是强迫“通古斯人必须接受一种新的、将政府的商业活动置于优先地位的意识形态。……一大批民族志学者受到现政府雇用”，从事“民族压迫的新形式”。（见161页注③）

另一方面，作者还对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对沙俄的态度作了歪曲。他说“满洲地区的通古斯人……对俄国人并没有嫌恶的反应。……甚至那些在义和团运动中受过俄罗斯人迫害的通古斯人，以后也很快恢复了过去的良好关系。”（见148页）这些说法是颠倒历史事实的。事实上许多鄂温克、鄂伦春老年人对他们的先人在黑龙江以北遭受“罗刹”（即俄国侵略者）奸淫抢掠行为记忆犹新。特别是提起在义和团运动中，沙俄侵略者大肆屠杀居住在江北六十四屯的我国各族人民，并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赶入黑龙江的暴行，更是义愤填膺。

本书在学术观点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作者对许多问题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考证，其用意在于说明社会的发展变化。但是，

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则只强调各民族间的影响，却很少分析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如对亲属称谓的研究，作者认为他们的亲属称谓主要是因为受到周围民族的影响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对亲属称谓制度变化的内因，即经济基础的变化则注意得不够。事实很明显，接受外族的亲属称谓，是由于通古斯社会内部的需要。

对风俗习惯的调查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在这方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不免有烦琐、猎奇之处。他对我国境内“兴安通古斯人”，尤其是对巴亚基尔氏族性格的描述，显然存有偏见，已超出了科学记述的范围。

本书虽然对通古斯的社会经济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但搜集的资料不多，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材料更少。对通古斯社会经济形态未能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因此，读完本书，难以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通古斯社会形态的概念。这是资产阶级民族学者的通病，本书作者也仍未能跳出这个圈子。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作者的实地调查是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进行的，他的调查比我们早四十年，我们调查时已经消失的社会现象，在他调查时还存在或还有其残迹，因此，他的著作是有坚实基础的，显然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解放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曾组织我国民族学者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其中仅对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等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就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资料，现在正在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和著述。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有助于读者对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社会历史的了解和研究。

本书原著为英文，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由日本人川久保悌郎和田中克己翻译成日文，于一九

四一年在东京由岩波书店出版。我们是利用该书原著和日译本两种版本翻译的。吴有刚用英文原著翻译了其中的作者序言、第一、第二和第五章以及书内所附的地图、特殊词汇、引用书目和索引。赵复兴从日译本翻译了第三、第四和第六章。孟克从日译本翻译了绪论、第七、第八和第九章。最后由吴有刚按原著对所有译稿进行了校核。

书中的地理名称均按原著译出。

书中语言学部分和通古斯语的名词术语，因汉字的限制，在译音上难以做到近似，因此书中第一次出现时附上了原书所用的注音。书上页边、注释和索引中所注的页码均为原著页码。

日译者所加的注释，我们认为有参考价值的，也予译出。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序言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我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間我又去蒙古和滿洲作了考察，本書就是根據這些考察中所搜集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成果。這些分析研究的一部分是我在中國和其毗鄰的各地方進行調查的最後幾年中完成的。我最初의兩次考察得到了俄國中亞和東亞調查委員會的援助，第三次考察是在聖彼得堡帝國科學院的指導下，以滿洲探險的名義進行的，而且經費的一部分是靠他們資助的。一九一七年，科學院派我前往中國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亞毗鄰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繼續過去幾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就因為整個遠東，特別是西伯利亞各地陷入不安定狀況而幾次中斷。我所研究的性質也改變了，新資料的搜集幾乎僅限於漢族人類學的問題。

這些考察並不是我個人提出的，而是當時聖彼得堡的一些東方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的學者的共同願望。他們對當時還沒有進行過全面調查的西伯利亞及其鄰近地方的新資料（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的搜集工作非常關心。我應特別感謝已故的拉德洛夫先生，當時他是帝國科學院院士、聖彼得堡民族學和民族志博物館負責人，是他鼓勵了我開始從事這一研究事業。我在進行首次調查之前，接受了波蘭利沃夫大學教授科特維奇先生在有關語言學調查方面非常寶貴的忠告，他是當時同聖彼得堡大學有聯系的俄國中亞和東亞調查委員會的會員。經

过一九一二年在后贝加尔第一次考察后，我在利沃夫大学教授切卡诺夫斯基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人类学资料的分析。当时这位先生是前述博物馆的馆长，他对我继续从事人体测量资料的搜集工作给予了精神上的支持。我也对我的妻子希罗科戈罗娃的有力帮助表示感谢。她在整个考察过程中，不顾生活物资的缺乏和旅途中的困苦，对我的资料搜集工作帮了很大的忙。实际上，在这些考察中，她的参与不仅扩大了我搜集资料的范围，而且便于我们同停留之处的通古斯人和满人建立友好关系。因为，即使是和平的考察者，如果不带家属，这些民族通常也是不大信任的。再者没有妇女的帮助，对某些民族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的了解也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对事实的观察，尤其是同一时间在不同地方进行各种习俗和礼仪的观察，至少需要两名实地观察者的协作。

vi 对我的考察工作做过贡献的所有各位，难以一一表示感谢。俄国地方当局，从后贝加尔和阿穆尔州的总督，到地方小行政区的官员，还有各个地方的移民局、阿穆尔河管理局、各个税关以及若干地方研究团体、政府的各个部门的地方代表在我需要或提出请求时，他们从未拒绝支援。同样，在满洲的中国地方当局也给予了各方面的友好帮助，才使我的考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我还高兴地指出，在我进行调查之际，曾受到当地俄国居民非常可贵的帮助，尤其是两位哥萨克，我感到应该提出他们的姓名，即额尔古纳河畔旧楚鲁海图村的居民伊凡·佩什科夫和阿法纳西·捷穆尼科夫。一九一五年我在西北满洲进行考察时，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自始至终跟随着我。①如果没有他们二位的丰富经验（他们当时都已四十多岁）和守纪律的精神以及个人的勇气，那次考察工作是没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他们二位理应受到政府当局的表扬，但遗憾的是，一九一七年俄国

旧政权崩溃以后，随之成立的政权，按他们的观点，并没有重视这件事情。从此之后，地方当局不仅不支持，反而妨碍我的工作，我同他们经过几次交涉之后，决定返回圣彼得堡。

在这些考察中，我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包括满族在内的通古斯人。我对他们的各个集团进行了系统的访问。一九一七年结束的第三次考察，持续了两年多。本打算对满洲各地都做一次充分的考察，可是考察的最后阶段没有能够完成。因为海拉尔以南、齐齐哈尔以北的地方发生了地方性的政治纷扰，这部分是受了在俄国发生的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民族大动乱的影响，从而使考察工作中断。我到圣彼得堡后不久，又到了中国。一九一七年末在北京进行了对满族的考察。可是从一九一八年春季以来，除了偶尔对曼科瓦通古斯方言进行研究和对满洲的短暂访问以及见到几位通古斯人之外，我就再也没有到通古斯人和满人居住的地区去考察的机会了。至于对民族志学方面的研究，只限于我在西伯利亚的两次较长时间的访问，以及在远东停留期间所遇到的欧洲人和非通古斯集团的范围之内。这些研究，虽然同我从前对通古斯民族志方面的考察离题很远，可是对我在一般民族关系上，以至对通古斯人的关系上的基本观点却产生了某些影响。

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期间的考察中，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民族志的观察，即通古斯和其他民族集团的文化现象；（二）通古斯语的各方言和满语（主要是在琿琿地区和北京）的研究；（三）对通古斯人和其他民族集团人类学方面的测量；（四）考古学的初步发掘——一九一六年在黑龙江流经小兴安岭的峡谷和布拉戈维申斯克^②之间的黑龙江岸边的几处历史古迹和史前遗迹的发掘。这次发掘工作除了我的助手希罗科戈罗娃夫人以外，还有古罗夫、托勒玛切夫和费多罗夫诸位先生的协助。严酷的气候条件只允许我们的

发掘工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发掘工作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努力；（五）对尚未勘查过的地方（如西北满洲）进行地理学观察。

关于上述（二）、（三）、（四）方面的资料，以后我将有机会在其他著作中做详细报告，其中某些资料，我已在以前的著作中（参照本书引用书目）使用过。有关西北满洲的简短地理学报告，连同我的经纬度测量已由希罗科戈罗娃夫人发表。^④

民族志方面的资料，主要是从驯鹿通古斯人那里搜集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后贝加尔游牧通古斯人，满洲驯鹿通古斯人和满洲通古斯人那里搜集的；而且还来自满族和部分来自索伦人、达斡尔人。照片和有关考古学以及发声学的记录和有关民族志方面的搜集品，除了那些不能用小包裹邮寄的16公斤以上的物品外，当前均保存在民族学、民族志博物馆。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间所搜集的民族志资料，已于一九一四年献给科学院，以《后贝加尔鄂伦春民族志》（俄文）为名发表。可是这部书出版的时机不合适，从那时以来，对其他集团已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察，补充了新的资料。现在我在中国所从事的人类学的调查和当地条件，使我对通古斯民族志的考察工作难以开展。正因为如此，关于通古斯民族志的资料，只限于我以前所搜集的资料。自从在中国进行的人类学考察工作占据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以来，我遇到了民族志资料的问题。如众所周知，调查者搜集到的材料，往往保存在私人手中或在其他文库里束之高阁，无人知晓，而新的考察者却须常常从头开始，重新进行。在一个人打算用自己的论文从容地去对付那些有良好的图书馆为后盾的批评者的时候，由于我是在中国进行工作的，在这种条件下，我深知发表我搜集到的材料，即使不viii 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的确，在作者易于受到批评的情

况下，仅仅是没有图书馆这一点，也足以使人望而生畏，失去把自己资料发表的那种干劲和愿望。另一个障碍是，我的材料必须用英文出版，而英语既不是我的母语，甚至也不是我专门学习过的语言，因此难以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恰如其分，并且也难以写出不伤害说英语的人的感情的文体。实际上假若我能用俄语写这本著作，对我将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二三年，在英国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的好意鼓励下，我将自己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一本——《华北人类学》用英文发表了。在一九二四年，又将另一本著作《对满族氏族组织的研究——满族的社会组织》也发表了。

对满族的调查，在我的调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因此我认为那份资料并不很重要，仅仅作为比较之用，先用上述名称发表。在本书中我将多次提到该书。在本书的一部分已付印之后，我才看到豪尔的评论。^⑤他对我的那本书有些误解，下面稍微谈几句。那篇评论的大部分是针对我书中的语言学方面进行批评的。实际上，我所记录的关于满族氏族名称的解释，主要是从没有受过教育的满人那里听到的。豪尔对这些解释的来源，显然未予注意，误认为这是出自我手。他宣称，这些解释是我的“谬误”和“过失”。^⑥从民族志学的观点来看，民间语源学和科学的语源学之间往往是有矛盾的。然而无论如何，民间语源学也多少有些价值。正因为如此，我对满族氏族名称，凡是能找到解释的时候，我都记录了下来，而没有明确注明它们来源于满族。它们的质朴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丝毫没有考虑到会使专家们产生误解。^⑦然而，我这种想法是错了。在许多批评中，豪尔是第一个想使读者相信，这些语源是由于我本身在语言学方面的重大错误所造成的。

关于满族对有关自己起源的传说，尤其是有关阿普凯汗的传说，^⑧情况也类似。这个传说，从历史学来讲是错误的。

因为阿普凯汗的统治竟然发生在努儿哈赤率领下，满族已经形成政治实体的半个世纪以后，为此我特别加了一条脚注（《满族的社会组织》11页脚注5）。但豪尔没有看明白，却一味指责是我“弄错了”。再者我对满族的民间传说是负不了责任的。在豪尔不得不去进行反驳当前满族传说的讨论时，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并造成读者的误解。然而在“满洲”这个名称的转写和起源的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把满语文言的词汇和名称，按还没有汉化的满族的发音转写下来，并将琿琿地方的满语口语转写下来，在这些方面我是负有责任的。我选择了一种便于印刷的转写法，然而采用这种贫乏的手段，不可能表现出发音的所有细微之处。豪尔跟我持不同意见，凡是我的满语转写同常用的音译法有出入的地方，他都作了更正。阅读一篇满文，不论是音译的，还是用满文书写的，对于熟知满语的专家来讲，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实际上，这些词汇的满文拼写，是很容易从辞典中查到的。正因为如此，我借此机会谈一谈满语文言的当前读法。满语口语，也是语言学者和民族志学者感兴趣的问题。而这对豪尔来讲，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我不同意将“满洲”这个名称的起源，说成是来自“文殊师利”等等假说。我已在《满族的社会组织》一书中，表明了我不同意的理由。实际上，在戈尔斯基已经对各种说法和传说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之后，豪尔所采用的解释再不可能成立了。对于斯塔克·托勒提出的“满洲”起源于“蛮子”的设想，我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这一点可在我的《满族的社会组织》的本文和序言中非常明确地看出来。在同一序文里，我已表示过我并不自认为是一名汉学家，但从汉学的观点上，对我进行任何正当的批评，我自然都是非常赞赏的。在撰写《满族的社会组织》时，我并未想把它写成一本叙述满族历史的书，这只会招致汉学者、民族志学者、语言学者、民族学者和考古学者们的共同攻

击。他们的名称，主要从民族志学的观点上，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所提出的解释是基于历史资料和民族志学资料的综合。再者，对满洲这个名称的起源，满族本身也争论不休，这是人所共知的，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得到使人满意的解决。豪尔的译著《皇清开国方略》是为增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而出版的书籍之一。实际上众所周知，其中最主要部分已被欧洲学者们阅读、翻译，而且对其中一部分也进行过批判性的分析和出版。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写出的著作，是不能予以绝对信任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本可以信赖的历史文献。而且在现代中国历史学者中流行的意见是，许多纯属历史的问题，不管对史籍进行怎样周到的分析也无法解决。他们需要民族志学、民族学的帮助和考古学的证据。对满族历史来讲，这种道理尤为正确。因为有关满族的历史文献，最早是在他们取得统治地位前不过几十年期间写出的。所以豪尔将自己局限在汉学领域，仅靠自己翻译和注释的著作来决定问题是有些过分草率了，因此自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上面我之所以讨论豪尔对我的《满族的社会组织》的批评^x，是因为本书也是使用同样方法撰写的，即我提供了有关通古斯起源和氏族的传说，并在可靠的历史证据和比较的方法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了分析。我还记述了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的名称，特别是氏族的名称，并阐明了这些名称的通古斯解释的价值，这对满族的氏族名称也同样是有意义的。这样记述通古斯人对其社会制度、历史和氏族名称的解释，可能又给在处理有关的民族志学（以及历史学）证据时遇到困难的那些人一个新的机会，使他们再去评论我的“谬误和过失”。这样的批评者，今后可能会陷入跟目前豪尔一样尴尬的处境。在评论的结论部分，豪尔竟然企图使读者相信我连满语的数词也不懂。^⑨我感到遗憾的同时，不得不声明，如果他不改变这种讨论方式，

不可避免地将使许多作者不再同他继续讨论。

下面我返回来谈一谈我的其他未发表的资料。我所翻译的通古斯民间传说和编纂的通古斯语词典没有能按我所期望的时间出版。我也改变了原来只用自己的资料出版一部词典的打算。这是因为我正在准备发表其他资料的时候，有几位作者已发表了其他语言和通古斯其他方言的类似材料。从那时以来，施密特教授和季托夫及波佩二位先生也发表了一些新资料；而且科特维奇教授还热情地将自己未发表的一些资料供我随意使用。所以这部辞典需要进一步整理，对民间传说做某些修正，并增加一些注释。

我本来打算在本书之前，先写出一部关于通古斯人物质文化的著述和一篇广泛介绍他们居住地区的一般历史、地理的文章。可是我所搜集的实物和照片，未能到手，什么也干不成。为了避免误会，我在探讨通古斯人社会组织的几个章节之前，先对地理状况进行简短的叙述，并用两章的篇幅论述通古斯诸集团的分类，及其形成和迁移的历史。用这种方式提供资料，本书就没有办法做到各部分之间保持均衡。

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偶然得到了前面提到过的《后贝加尔的鄂伦春民族志》的修订本，这本书和我的其他资料一起被用于本书中。

至于通古斯语言的转写方面，为了尽量做到与我原来的记录相近，我采用了记录亚洲语言所用的俄国“科学院转写法”。对汉语的转写，或者用通古斯语以及满语那样的标音，或者用贾尔斯等人采用的罗马化的常用形式。

本书所以没有附上应有的结论，是出于以下考虑：即本书只是我的民族志学观察的一部分。如前所述，社会现象同其他文化现象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对通古斯民族志，其中包括通古斯人的思想体系和通常所谓的“宗教”，不作一般的全面论述

的话，许多社会现象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的。这个问题将在我的另几本书中探讨。至于通古斯人的形成及其历史，情况也是同样的，因此我决定在今后的著作中再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及其历史，做出一般结论。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图，本书所附的几张地图上河川和山脉的位置并不那么精确。不幸的是，我的西北满洲地图的原图，同在上述考察中所搜集的许多资料，同样没有邮寄到，那张图上标注了我对地理观察的摘要。加之，一九二〇年正好在我急需离开西伯利亚之前，我所携带的地图草稿同其他绘制的地图资料和我私人的文献书籍一起失窃了。所以本文所附的地图，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只不过是大概近似而已。至于各民族集团的边界，也不能如所希望的那样画得非常精确。在绘制通古斯分布图的时候，我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就是民族的边界，以什么时代为标准的问题。我在本书中提供的某些最近迁移的实例和西伯利亚某些民族集团已经灭绝的事实，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要想绘出现在各集团的实际分布状况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我决定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在后贝加尔和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在满洲和蒙古的我本人考察到的实际情况来表示。另外我也没有找到同时期的资料，因此不能绘出我所没有考察过的其他民族集团的边界，这些疆界也只能是尽量做到近似正确。实际上，洛帕丁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七年发表的关于果尔德人和奥罗奇人的地图是比较正确和详细的。他的地图比我的资料晚近了十年，因此不能认为与我的资料完全是同时期的。关于这些集团地理分布的详细情况，请读者看洛帕丁和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

我未将汉人和俄罗斯人的聚居区标出；对其他非通古斯集团也未标明确切的疆界，因为这些集团的人数远比通古斯人多得多。汉人和俄罗斯人到处可见。如果将他们的情况在地图上

标出，将会造成通古斯人的分布情况的严重混乱。^⑩再者，我们也不知道通古斯地域所有居民的确切人数。

xii 地理名称，是我遇到的困难问题之一。在本书中没有用统一的拼写法。对那些英文读者熟悉的和已经有固定转写法的名称，我沿用了旧的转写法，但对那些不常见的或完全陌生的名称则用近似音转写。还有一些在俄文图籍中已经固定的名称，按俄语发音书写，而许多其他名称则按通古斯语的原有形式，用近似音转写。为有助于读者检索，书末附有地理名称索引。

我的搜集品中的某些图片，因为现在不在手边，未能复制刊出，深表遗憾。书中只附了两幅水彩画——一幅表现了一名涅尔泰斯克妇女遗体的葬法，另一幅画出了在维季姆台地（维季姆坎河）的一个通古斯人的“斜仁柱”^⑪（这两幅画汉译本未刊出。——译者）。愿意了解通古斯人面型的读者，可以参考扎普利兹卡小姐的著作。^⑫使我感到极为吃惊的是，我在扎普利兹卡的著述中发现有六幅图片是按我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民族学和民族志博物馆的搜集品复制的。其中四张是后贝加尔通古斯人的四种面型的照片。^⑬

一般来说，关于通古斯人的民族志方面的著作还不多。麦佐夫的《西伯利亚书目》刊出了部分有关书目。阿扎多夫斯基又作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从中可以看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用俄文出版的一系列著作的书目。在研究各个集团^⑭和问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某些引用书目，在西伯利亚各种研究机构最近编纂的地区书目中也可以找到。有些英文书目可以在巴德利、扎普利兹卡、哈洛韦尔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在不出名的出版物中虽然不能期望找到多少关于通古斯的文章，但其中确实也有些根据个人观察所写的有价值的作品。有朝一日也许会遇到一位博学而勤奋的作家能够编出有关通古斯的完整书目，但我已